

对话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

高校不应做排名高墙内的“深宫怨妇”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竞争,有竞争就会有排行。对于如今的各大高校来说,不论是学校排名还是学科排名,都是一件让人既爱又恨的事情。它在某些方面虽然能够刺激学校发展,但是却同样存在漏洞和隐患,为高校和学科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五届年会暨“重构教育评价体系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在谈及他眼中大学排名的是非功过,直言“大学排名害惨了教学,也害惨了人文学”,学者不该做“深宫怨妇”,而应当积极介入排名规则、标准的制定中。

大学排名的是非功过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在您看来,大学排名对于高校的发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陈平原:早在十年前,我就专门谈到大学排名的问题,那时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学排名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对于大学排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存在质疑。

目前,高校排名只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做假的。即便数字不作假,也会有些数字有效,有些数字则无效。而人往往都会趋利避害,尽量生产对自己有利的有效数据。这种用“数字”的衡量方式,会使得大学的教学、科研等各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受到损害。

大学校长对排名也是又爱又恨,明知这样的衡量方式有问题,但迫于整个大环境,又不得不参与这样的排名。可以说,大学排名给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中国科学报》:您曾经提到过,目前高校中,被大学排名害得最惨的是教学?

陈平原:大学的使命是教育、培养人才。以曾经的西南联大为例,在其存在期间,西南联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其本科生和研究生们的教学。那时西南联大的研究生人数不到100人,资金的短缺也导致了很科研实践都难以进行。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下,学校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如今,在大学排名的大规模下,很多超出数字统计之外的工作会被无效化,教授们也普遍不再愿意把时间投入到学生身上。特别是大量本科生的教育资源,被投向了那些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中。这使得近20年来,中国大学固



陈平原

然在飞速发展,但却充满了内忧外患。

在排名的影响下,大学的个性也都逐渐被消灭和同化,很多大学都在举全校之力做同一件事情。而在我看来,再伟大的事情也不可举全校之力,这等于把大学的教育功能彻底废掉了。

被害惨了的人文学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被大学排名害惨了的不仅是教学,很多学科也深受其害。那么您觉得最受其害的是什么学科?

陈平原:我在很多篇文章中提到过,大学排名对于大学和院系都会产生影响,但最不能够忍受的是人文学科,损害最严重的也是人文学科。

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成果的评定和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定,虽然标准不一,也受到很多人的诟病,但是相对来说还是“靠谱”;然而,这种标准在人文学上就不“靠谱”,人文学里的特异性、精神性以及思想性最容易在排名中被抹煞。

在社会更喜欢用数字和金钱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衡量学科价值的今天,人文学科显得更

加脆弱,也更易受伤。我们看到很多高校都想要成立或合并医学院,因为其投入和产出明显,对学校排名也有着显著的帮助。但却很少有学校想扩展或增强文学院,因为它的“效果”不明显。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名中文系的教授,您认为人文学为何在大学排名中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陈平原: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每个大学的评价体系里都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只要是数字化的评价,就容易出问题。在排名和评价中,用与衡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同的标准来衡量人文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社会上喜欢看得到、摸得着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整个社会就有“重工轻工”的倾向,在大学里一旦排名,就必须有数字,但是思想是看不出数字的,更不能够用数字加以衡量。

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好的剧作家、文学家和好的史学家做学问,一个人、一个脑袋就够了,不一定非要组建一支团队。这个特点在越优秀的人文学家身上,表现得越明显,他们往往是特立独行的。在北大,我就认识很多这

样的人文学者,他们不要课题,只凭良心、凭学问、凭大脑,一直前行并不断有成果产出。而且这些成果比同学科中,那些手握很多经费的人花费三两年就出产的成果要好得多。

因此可以说,当前用课题项目、重大资金、庞大团队等数字做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对自然科学会有损害,对人文科学的损害尤其明显。

积极介入,不做“深宫怨妇”

《中国科学报》:既然人文学在大学排名中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够保护人文学,扭转这样的局面呢?

陈平原:当前,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意识到人文学的重要性,让大家看到这个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学科,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发展中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自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壮大,人文学被逐渐边缘化。因此,人文学更需要相关学者站起来,捍卫自身位置。而不是做“深宫怨妇”状,只知道批评和抱怨人文学不被重视。我们需要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说出人文学在人类文明、国家建设、文化传播与传承等方面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科学报》:除此之外,针对当前学科排名的现状,我们还能采取哪些方法,保护人文学不被排名损害?

陈平原:我们还要抓住一些机会,积极参与到评价体系的制定和改革的过程中。既然当前的评价体系、指标不完全适用于人文学科,那么在包括评价标准、操作流程、指标、权重的设计等各个方面,我们更应该积极地提出完整建议。

事实上,对于一级学科的评估和排名,很多人刚开始时并不满意,但是在专业领域内的人士积极参加制定工作,并不断征求专家意见后,最终确定了哪些东西要、哪些东西不要,以及不同内容之间的权重如何等,才使得一级学科的评估有了很好的改观。

如今的大学排名也是如此,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应该多倾听一线工作者和学者的声音,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不是以社会和政府等利益群体作为导向。同时,专业的研究者除了批评排名之外,更要共同参与到逐渐完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努力让中国产生一两个比较可信的评价体系或努力,这才对得起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

记者快评

大学生教育,成才更须成人

■王之康

近日,加拿大法庭对加拿大皇后大学高分子化学博士毒杀案作出判决,判处王某7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被遣返中国。未来10年不得持有武器,且不能与受害者或其家人联系。

看到这则令人痛心的新闻,笔者首先想到了一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待细看整篇报道后,笔者又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被告人王某学术成绩十分优异,不仅在化学学科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还申请了科学技术专利,甚至在2015年,皇后大学还专门表彰了他的学术研究成果。

如果把时间回拨至几年前,大家也许会发现,这与当年轰动一时的“复旦投毒案”何其相似:同样都是在名牌大学就读,同样都是师生公认的优秀学生,但却做出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如此有才之人,为何无德呢?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

有句俗语,有德而无才者虽不能造福一方,但总能够行于世;有才而无德者,必为人之祸患,小则破坏邻里,大则陷害四方。用它来评价才与德的关系,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众所周知,我们的教育历来重视成才教育,即重视能力方面的培养,而对于道德或者说成人方面,则多由中小学的副科以及大学里的选修课来承担,在重视程度上,远不如前者。

有才之人,虽然能得到师生的认可,能得到很多奖学金,但无德,终究会是一个害人害己的社会渣滓,而且危害性很大。

实际上,有才而无德的例子岂止这两个投毒学生?今年上半年,厦门大学女生辱华事件,想必很多人依然印象深刻。

因此,笔者以为,我们的人才培养不可偏废,在当前加强大学生成才教育的同时,也要重视成人教育,加强对“德”的培养。有才而无德是大忌,否则类似悲剧难以避免。须知,德才兼备才应该是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的反思

■李富家

近期,国内外媒体曝出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事件(简称“事件”)。事件影响恶劣,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广泛担忧。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国家卫健委、科技部等部门相继发表声明,若情况属实,认为该项“研究”没有先进性可言,对技术的应用严重失当,严重违背了基本伦理规范和科学道德,且该“研究”属于违法行为,实施了明令禁止的技术操作。

于情于法都显然有悖常理的情况下,该项“研究”还是横空出世,震惊了中外,为中国的学术界抹黑。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关于学术伦理教育的深入反思。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出现,追根溯源,要切实加强对未来科研主力军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开展学术伦理教育。

首先,要站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政治高度,重视对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学术伦理教育。该事件为高校进一步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敲响了警钟,这也印证了教育部近期发布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非常必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事发后,主要当事人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依然高谈阔

论。从他的发言中可见,他的学术伦理观是极度扭曲的,也缺乏科研工作所应具有的基本的职业操守。要避免此类疯狂事件再次上演,我们要站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政治高度,站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培养高素质科研队伍的高度,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加强对未来科研主力军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学术伦理教育。

其次,要把学术伦理教育纳入高校与科研院所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现行教育体制下,高等院校承担着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培养任务,科研院所承担着部分研究生培养任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学生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并于2016年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但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术伦理教育在文件中很少被提及,在实践中容易被忽视,在具体的操作中往往以学术诚信教育代替了学术伦理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就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学生和研究生是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的主力军,针对这一事实和特点,要把学术伦理教育明确纳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设计专门的教育活动载体,做好“抓日常、抓经

常、抓落实”。

再次,重视对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学术伦理教育就是要培养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工作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从事件中看出,在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法律所禁止的情况下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胚胎操作及临床应用,这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对国家法律和学术伦理的亵渎,与“大爱大德大情怀”背道而驰。

培养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反映在科研领域就是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要有敬畏生命之心、服务社会之用、遵守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之心。

高校和科研院所要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广大教育和科研工作者要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坚持以德立身,以德施教,为学生做好榜样示范。重视对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学术伦理教育,加强责任意识、规则意识、法治意识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培养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党委副书记)

域外传真

大学生毕业后自主创业少原因何在

■罗伯特·菲利普斯

创业教育已经存在了近50年,它对于未来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有数据显示,近些年有4.7%的高校毕业生选择自主经营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其中仅有0.6%的毕业生是真正开始自主创业的。过去三年,在普通人群中也只有8.7%的人选择自主创业。为什么这些未来无限光明的年轻毕业生们,毕业后不选择构建自己的公司呢?

乍看起来,创业教育在大学中进行得很好,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创业教育在大学校园中如此受欢迎,不论是否学习商科专业的学生,都能够接触到相关的课程。训练营、鼓舞人心的演讲、工作坊、创业教育比赛……创业教育的课外活动也如此丰富。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阻碍毕业生们创业的脚步呢?

如今的学生们投入了过多的金钱和时间在接受教育上,使得他们十分不愿意承担风险。因此,相较于一开始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且收入微薄的自主创业,学生们更青睐于毕业后有

一份稳定的工作。同样的,很多选择创业的学生也是在大公司的资助下进行的,这些公司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为自己培养、挑选出潜在的企业家。

此外,创业教育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一些关于创业的演讲中,永恒不变的话题是讨论“失败”问题,经常会解释“失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此频繁的“宣扬”不畏失败,有时也会阻碍学生创业的脚步,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自我能力评价和信心产生怀疑,使得学生最初创业的激情被扑灭了。

事实上,创业相关课程的训练对于学生是大有助益的。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接受过创业课程训练的学生在交际、演讲、团队合作等能力上都有所提升,这样的学生也更容易被企业聘用,获得丰厚的薪水。因此,大学应该拓宽创业教育课程和训练,但是目标不应该只放在毕业后有更多的学生自主创业上,而是要营造出创业氛围,培养企业家精神和文化。

在创业教育上,大学和学生都有很多工作可做。有企业家校友就曾建议学校在为学生提供创

业教育训练和课程时,可以少一些学术上的话题,而应该增加诸如税收、财政预算、记账、人事管理等更具有实践性的训练。

自主创业的人群开始创业往往是在25-34岁这一区间内,这时他们往往已经踏出大学校门多年,所以大学要做的就是告诉有志于创业的年轻人,踏出大学校门后开始尝试创业是值得的。

(作者系曼彻斯特大学企业中心创业学高级讲师,许悦编译)



图片来源:卫报网

公民科学素养:提高批判性思辨能力

■蔡基刚

最近,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在一个大会上关于“衡量标准和方向”的论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作为语言教育工作者,笔者所关心的是他的语言逻辑推理不严密,甚至有点混乱。

比如他的这段推理:“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的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于女性,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首先,“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宋词”和“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这是一个假设。作为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主观假设怎么能够得出“那全中国的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和“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样的结论?

其次,作为一个虚假的、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设,又怎么能够得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这一结论呢?又怎么以此为依据继续推理出“中国女性的堕落”?

第三,“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于女性”,这个结论的依据何在?国家好不好是哪个方面,是精神文明、人文素养还是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笼统地说“国家好不好”,责任“在女性”,让女性承担一个国家的责任,推理多少有点荒谬。更令人吃惊的是,俞敏洪把这种推理方法发挥到极致:“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这个结论的预设是“中国女性是堕落的”和“中国整个国家是堕落的”。什么是预设?预设即客观存在的事实!

俞敏洪这种推理,实际上是我们高校开设的“批判性思辨课程”中分析的典型案例,也是我们不少人语言交流中的常见病。

“批判性思辨”是对人类一般思维的审视,即审视人们在进行推理、形成意见、做出决定和得出结论时是否符合逻辑,它致力严谨的科学推理和质疑求真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和科研创新的基础,也是公民最基本的科学素养。在西方社会,这门课程往往是高校的通识教育中的必修课程。批判性思辨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审视假设与论点的关系、事实与观点的区别、方法与结论的对应,等等。

批判性思辨认为,科学的论证是基于前提与结论的相配。如按照三段式逻辑推理(结论:苏格拉底会死;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大前提:人总是会的死),说“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的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前提是“中国所有男人都会听女人的”。这个前提存在吗?如果不存在,那么会有“如果……那”的结论呢?

所以批判性思辨能力就是去发现观点或结论背后隐藏的假设或预设。如果一个女士告丈夫家暴,法官在法庭上对她丈夫说: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即可,我的问题是“你已停止对你妻子施暴了吗?”这个丈夫听后很难回答了。因为这个问题的预设这个事实:你丁了你妻子了。不管回答“是”或“不是”,都不能否认“你施暴了”这个事实。事实和假设或观点完全两回事。

同样,前不久,笔者曾写了一篇硕士论文,学生的假说:凡是音乐好的,英语的听说能力都很强。他通过问卷调查(如是否学过音乐;英语四、六、八级考试或雅思托福考试成绩)和半年的跟踪实验(英语能力测试,然后通过半年音乐学习,英语能力测试)证明了这一点。但他的证据只能证明音乐好和英语听说好有一定关联,但并不表明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也不能证明某人的英语好是因为他的音乐好。很清楚,某人英语好,还有很多变量和因素,如天赋、环境、学习时间和学习方法等等。

方法运用是否合适很重要,方法不同结论就会相异。如最近看了一篇关于“城镇化对某一城市女士母乳喂养方式的影响”论文。尽管作者用问卷和访谈,调查了大量从农村到城市来工作的女士,也注意到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家人影响诸多因素,但却没有把宗教(佛教或基督教)、民族(汉族或苗族)、身体健康、初胎或已有子女数量等变量考虑进去。这些变量不放进去,结论会正确吗?

媒体和学术界在转基因问题上有争议。问题是农业或生物界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否对健康有害,这个结论并不能用到街上和超市通过采访方式(如家里吃不吃转基因食品?超市进不进转基因食品)来得得到证实,即使100%的被采访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也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是有害健康的。这就是不同学术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从北大毕业生、语言学校的校长讲出关于中国女性的话,说明批判性思辨能力的培养在中国各个教育段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我们的教育多少年来强调人文教育,忽视科学素养教育,忽视批判性思辨教育,已经影响到我们公民的科学素养和科研创新能力。现在应该到了重视的时候了。培养公民批判性思辨能力,科学素养教育任重道远!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